

NOBEL LITERARY PRIZE WINNERS' SERIES

1989



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

主编／刘硕良

为亡灵弹奏

〔西班牙〕塞拉
(1989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李德明等译



NOBEL

LITERARY PRIZE WINNERS' SERIES

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

主编/刘硕良

为亡灵弹奏

[西班牙]卡米洛·何塞·塞拉
(1989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李德明等译



漓江出版社

60155/03

(桂)新登字03号

· 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 ·

为 亡 灵 弹 奏

〔西班牙〕卡米洛·何塞·塞拉著

李德明 林一安译

*

漓江出版社出版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159—1号 邮政编码: 541002)

上海新华书店发行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4.25 插页6 字数332,000

1992年4月第1版 1992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8,800

ISBN 7-5407-0858-0/I·601

定价: 平 装 7.55 元
彩盒精装 13.15 元



〔西班牙〕卡米洛·何塞·塞拉（1916—）

（1989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新时期有数的宏伟工程

——《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序

刘硕良

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作品的译介，不自今日始。早在二三十年代，一些获奖作家的作品就介绍到中国来了。我们久已熟知的文学名著，如《约翰·克利斯朵夫》、《静静的顿河》、《布登勃洛克一家》等等，都是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的代表作。不过，以往这些译介都没有特别着眼于获诺贝尔文学奖这一角度，甚或有意无意地回避了它，而且所介绍的数量有限，大部分获奖作家还不为中国读者所知晓。

适应改革开放大潮推出的这套壮观的《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不同以往的零散译介。它以系统介绍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作品为己任，凡是这个头号国际文学大奖的得主，都要尽量为之单独选出1卷，体裁不限，长短不拘；每卷均有译序和授奖词、答词、生平年表、著作目录，力求给读者提供一个能真实地反映诺贝尔文学奖及其每一得主的风貌的较好版本。不仅过去译过的获奖作家的若干名著要适当选入本丛书，更要深入地介绍许多尚无译文、尚未在中国展露其庐山真面目的获奖作家的代表作。即使过去已有译介的作品，收入本丛书后，译文作了更新或校订，并增加了前言、附录，其译介的深度和精确度也已胜越于旧译。

为什么要如此兴师动众，有计划有系统地出版这么一套大

型的《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呢？当1982年丛书头4种问世时，就有人表示过怀疑。随着社会改革开放的深入，随着丛书各卷的陆续推出，随着人们视野的逐步开阔，在经历过从简单否定到一味推崇两个极端之后，对诺贝尔文学奖持客观的有分析的科学态度的人是越来越多了，这套丛书的价值和作用也已为文学界、新闻出版界和越来越多的读者所确认了。但人们的认识的发展总是不平衡的。直至现在，仍然有人不很理解：“诺贝尔文学奖不是资产阶级的吗？不是带有地域和政治偏见的吗？为什么我们要以它为标准来划线呢？……”为了更清楚地说明丛书的出版意图，回答关心它的同志的疑问，趁丛书加快出版进度、力争两三年出齐90卷，并采用统一的封面设计，各卷逐步纳入新的外形框架的机会，增写了这篇总序，谈谈这套丛书的缘起和设想，以进一步和广大读者沟通，并就教于各地方家。

*

*

*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不久，1978年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在长沙召开，首次确定了地方出版社“立足本省、面向全国”的方针，涉足外国文学领域的出版社很快由两三家增加到几十家。1980年冬才挂牌的漓江出版社面对并起的群雄，面对人民文学、上海译文两家最具权威的老牌出版社，感到要在众山夹峙的缝隙中走出一条生路来，非另辟蹊径不可。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我们推出了以《保尔和薇吉妮》、《白夜》、《巴黎的忧郁》开头的小开本“外国文学名著”系列，也正是基于要自成特色、要开拓新领域、要出一批名著而又少复以至不重复“人文”、“译文”足印的考虑，当郑克鲁和金子信两位先生1981年联合建议推出诺贝尔文学奖丛书时，我们很快就接受了。

不错，文学不同于自然科学，文学奖的颁发往往会和一定阶级的意识形态相联系。诺贝尔文学奖既生发于资本主义社会，就不可避免地带有那个社会的意识形态包括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的烙印。意识形态的不同，价值观念的不同，常常导致人们对文艺作品及其评奖工作的认识上的歧异。大家看到，一年一度的诺贝尔奖的评选，物理奖、化学奖、医学奖的得主，一般都众望所归，极少异议，而文学奖就比较麻烦，不时会引

起这样那样的诘责和批评。是不是一有非议就证明评委们评错了呢？恐怕还不能这么看。文学作品的特性本来就更容易使它人言言殊，不像自然科学成果那样有比较统一的、公认的、可以量化的鉴评标准，加之诺贝尔文学奖本身虽以张扬“理想主义”相要求，实际衡量和掌握时却有很大的选择空间，外人无从得知其内幕详情——即使是评委也不得透露近50年的有关档案，所以，在批评意见和评奖理由之间有时很难逐情直遂地作出谁是谁非的判断。但抛开这些因素不论，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工作主观上存在某种局限，有时囿于视野或偏见，以致较次要的作家获奖，更显要得多的作家却名落孙山的情况，是确实有过的。

以地域来说。诺贝尔文学奖从1901年开始颁发，到1991年止，中间有7年因战争未授奖，有4年每年授予2位作家，实际得奖作家共有88位（萨特未领奖）。他们分布在5大洲30个国家，而主要集中于欧美，其中法国12人，美国9人，英国8人，瑞典7人，德国6人，意大利5人，西班牙5人，俄苏4人，挪威、丹麦、波兰各3人，爱尔兰、瑞士、智利、希腊各2人，比利时、南斯拉夫、捷克、冰岛、芬兰、以色列、尼日利亚、埃及、南非、印度、日本、危地马拉、哥伦比亚、墨西哥、澳大利亚等15国各1人。尽管评委会近几年第一次颁奖给非洲和阿拉伯世界的优秀作家，受到舆论的广泛好评，人们仍然觉得还有一些地区和国家的杰出作家理应更早更多地进入获奖行列。就拿亚洲来说，获奖作家迄今仅有2位，而北欧却有12位，悬殊如此之大，无论就各该地区的文学状况或就其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来说，都未必与实际相副。造成这种悬殊显然不单纯是亚洲文学翻译介绍少所能解释得通的。

以作家来说。一方面，托尔斯泰、博尔赫斯这样一些文学大师未能获奖，总使人不免有遗珠之感（受损害的决不会是这些大师本人），特别是拿他们和某些获奖作家的实际成就与历史作用相比较，更让人难以理解评奖的天平究竟是怎样倾斜的。另一方面，某些对社会主义持反对态度的作家，包括社会主义国家的流亡作家得奖，除了他们文学上的业绩外，明眼人都不难看出其中政治因素所起的作用，不然为什么不授给那些文学成就显然更高而思想比较进步或者比较持中的著名作家呢。

凡此种种，都是诺贝尔文学奖的缺陷和不足。其实，任何文

学奖的颁发都有一定的政治倾向和侧重角度，都受一定的价值观念和价值取向的制约，不可能十全十美、皆大欢喜。我们无意苛求诺贝尔文学奖，要它绝对公正，完美无缺；指出诺贝尔文学奖的局限，只是要如实地对它加以评价，不盲目地把它看得至高无上，不唯“诺贝尔”马首是瞻，不患“诺贝尔情结”。对任何文学现象和文学作品，包括诺贝尔文学奖及其获奖作家作品在内，我们都应该有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的独立的评判。盲目崇拜是最没有出息的。

明乎此，我们还要出版诺贝尔文学奖丛书，我想至少有三层考虑：

一、诺贝尔文学奖毕竟奖励了一大批卓有成就的杰出作家，他们的优异产品已成为世界文学宝库和人类共同财富的一部分，值得我们认真地研究和借鉴。许多举世公认的名家，如罗曼·罗兰、法朗士、莫里亚克、纪德、萨特、加缪、奥尼尔、福克纳、海明威、吉卜林、肖伯纳、叶芝、艾略特、贝凯特、托马斯·曼、黑塞、伯尔、肖洛霍夫、皮兰德娄、显克维奇、阿斯图里亚斯、聂鲁达、马尔克斯、帕斯、塞拉、拉格洛夫、汉姆生、泰戈尔、川端康成、索因卡、马哈福兹、戈迪默……荣膺了诺贝尔文学奖桂冠，使这项大奖当之无愧地拥有不凡的品位和隆盛的声誉。有些获奖者在世界范围内影响不算很大，但在其所在国或所在地区仍然占居重要的位置。至于有些作家获奖时呼声甚高；过后则影响减退，这在某种意义上应该说是正常的。中外文学史上都有一些作家如彗星划过天空，不能把光亮久留人间，但这并不排斥他们的价值有朝一日又可能重新得到人们的发现和承认。文学现象纷繁多变，我们很难简单地从获奖者一时声名的盛衰来断定其当年获奖是否允当。

二、诺贝尔文学奖~~书~~毕竟是本世纪以来国际上最重要、最持久、最有影响的文学现象之一，它对各国各民族众多作家的吸引力是有目共睹的。这一点，即使从它有时授奖欠公而引起种种议论也能得证明——证明它为世人为文坛所普遍关注。对于这样一项大奖，这样一种幅射面宽广、渗透力深远的国际文学现象，世界各国都颇为重视，我们中国作为文学大国，理应对它有尽可能如实的客观的了解，理应在占有丰富资料的基础上对它进行科学的审视和独到的评析，如果我们不系统出版其作品，又

有什么根据对它发出这样那样的指责和议论呢!

三、出版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不等于不加分析地全盘肯定这个大奖和所有获奖者及其作品。如前所述,获奖的不见得完全处于同一水平线上,未获奖的并不因此而贬损其价值。我们组编诺贝尔文学奖丛书,无非是在新时期改革开放潮流的促动下,从新的角度多开一扇窗口,对北京、上海已出的外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和 20 世纪外国文学丛书起一点补充配合的作用,丝毫没有以诺贝尔文学奖为标准来对外国文学作品划线的意思,当然也就谈不上以它来识鉴和取舍所有外国文学作品了。即从漓江出版社来说,我们在出版《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的同时,还推出了一系列其他外国文学名著和《法国 20 世纪文学丛书》、《域外诗丛》等众多的外国文学作品,诺贝尔文学奖只是其中一部分而已。

尽管如此,作为新时期我国翻译界出版界一项有数的宏伟工程,《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仍以它新颖的角度、诱人的色彩,受到了广大文学工作者和文学爱好者的欢迎和关注,得到了社会多方面的支持和鼓励。全国“八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包括了这套丛书。在新闻出版署主办的首届(1980—1990)全国优秀外国文学图书评奖中,这套丛书有 3 种——福克纳卷《我弥留之际》、莫里亚克卷《爱的荒漠》、阿斯图里亚斯卷《玉米人》同获一等奖,占一等奖图书总数 19 种的 15%。许多作家赞扬和购藏这套丛书,一次邮寄数十元、上百元到书店、出版社成批购买的不在少数。历届全国书市和在香港主办的中国书展,都把这套书作为重点陈列的展品。新华社多次用中外文向国内外播发丛书出版消息。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工人日报、中国青年报、解放日报、文汇报、《读书》、《世界文学》、《中国翻译》等大报刊以及中央电视台、国际广播电台等新闻媒体,多次介绍这套丛书。唐弢、李文俊、彭燕郊等知名作家都撰写过评论。丛书的影响甚至越过了国界,一些国外人士将这套丛书的发行,视为中国坚持对外开放、重视洋为中用、对诺贝尔文学奖持郑重态度的一个标志。瑞典诺贝尔图书馆收藏了丛书精装本,文学奖两位评委会见过丛书主编,谢尔·埃斯普马克教授并专程访问了漓江出版社,瑞典驻华大使馆和瑞典有关机构还在提供版本等方面给予了友好的帮助。丛书的出版无疑有利于文化交流,也有利于瑞

典皇家学院更多地了解中国的文学。

*

*

*

出版大型丛书，通常会有一个庞大的编委会，而编委会真正起作用的未必很多。《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的出版，不仅在书的内容和形式上有所开拓，在书稿组织上也希望做点新的尝试：不重名而责实，一切以质量为依托，以实效为依托。

首先确定总的构想和框架：在研究的基础上翻译，翻译与研究相结合，力求使每一卷成为了解该作家的优良选本并起一定的向导作用。这个总目标主要是通过四个方面的工作来实现的——

一、篇目：由于诺贝尔文学奖绝大多数是表彰某一作家的整体创作而不特指其某部作品，译本选目必须从授奖词中提名赞扬的作品和史家公认的作品中挑选，首先侧重其代表性和影响力，保证选目的权威，同时适当顾及篇幅、可读、整体平衡和少与其他译本重复等因素。

二、译文：尽量从原语种较好的版本直接移译，即使是译者寥寥可数的小语种作品仍绝大部分译自第一原著。由于组稿困难，个别需要转译的，或采用原著者自己翻译或认可的译本，或设法以原书进行参校，力求忠于原文，接近原文。译作以新译为主，少数旧译在收入丛书时作了必要的校订。希望较多地保持丛书的新鲜感，并传留一部分已有定评的佳译。

三、前言：务期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作家作品进行科学的分析和评论。强调占有丰富的第一手资料，融入国外最新的研究成果。只要言之有物，决不吝惜篇幅。福克纳卷的译序就长达4万余言，等于一本出色的福克纳导读或研究福克纳的入门小册子。

四、附录：尽量收齐授奖词、答词、重要访谈录和生平年表等有关配件，给读者提供较多的信息，提供据以作出自己评判的原始材料。这部分文字名为附录，实乃凤尾，读者对它的兴趣决不在正文之下，而且不可不读。

我们设想通过这些安排，在各卷有限的篇幅内扩充容量，提高质量，并共同形成特色，树立整体优势，不独使我国首次译介

的作家作品引人注目,即使我国介绍过的作家作品也能显示出新
的翻译水平和出版水平,让购置了其他版本的读者仍然会对
诺贝尔丛书中的新版本发生兴趣。

总的框架和构想确定后,最重要的工作就是遴选和延请对
获奖作家研究有素并能胜任译撰工作的专家来主持各卷译事:
提出选目,组织翻译,撰写前言,辑录附件。这些工作有的由主
持者一以贯之,有的则由他组织同道合力进行而最后总其成。
实践证明,各卷主事人选准了,工作做到家了,整个丛书的质量
就有了最基本的保证。

值得庆幸的是:诺贝尔文学奖的名气和中國知识分子赤诚
的事业心使我们顺利地得到了语种齐全、实力强大的中国社会
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以及北京、上海、南京、杭州、重庆、广州
等地许多专家的大力支持,先后共襄此一盛举的老中青优秀翻
译工作者多达200余人。像董衡巽、冯亦代、赵少伟、吴劳译海
明威,李文俊、陶洁译福克纳,巫宁坤译斯坦贝克,施咸荣译贝凯
特,柳鸣九译萨特,罗新璋译纪德,桂裕芳译莫里亚克,林秀清译
西蒙,高年生译伯尔,刘习良译阿斯图里亚斯,吕同六译皮兰德
娄,力冈译肖洛霍夫,高慧勤译川端康成,李野光译埃利蒂斯,林
洪亮译显克维奇,绿原译米沃什,文美惠译吉卜林,杨武能译海
泽,郑克鲁译杜伽尔,郭宏安译加缪,章国锋译豪普特曼,王逢振
译赛珍珠,吴岳添译法朗士,倪培耕译泰戈尔,邵殿生译索因卡,
裘小龙译艾略特,刘星灿译赛费尔特,申慧辉译肖伯纳,黄梅译
高尔斯华绥,石琴娥译拉格洛夫,李之义译海顿斯坦姆,林桦译
延森,朱炯强译怀特,宋兆霖译贝娄,荒芜、汪义群译奥尼尔,潘
庆舲译路易斯斯……都可说是恰当其人,有些人选甚至是国内再
好不过的人选。他们长期研究所译的作家,熟悉其全部作品和
风格,了解外界有关的评论,自然最有条件选准篇目、把握译文,
也最有条件写出高水平的前言来。

*

*

*

丛书起初是分辑出版的,每辑各书在年代、国家、体裁上稍
加搭配并有框架统一的封面,但辑与辑之间年代交叉,封面各
异,读者保存和查找感到有些不便。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特邀著

名装帧设计家陶雪华女士统一进行整套丛书的设计,各卷封面统一,书脊上标明获奖年份,便于读者按年代先后排放。平、精装本均有前后环衬、作家肖像和丛书总序、总目,精装本还增加了彩印函套。过去已出的各卷,重印时将统一调整,个别卷为两位作家合出的也将单独分开。预计到1993年,如果还有两位作家获奖,丛书就将恰好排满90卷,以后新增1位增出1卷,《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这项系统工程也就大功告成并能不断增加活力了。

与丛书配合印行的还有正在编辑的《诺贝尔文学奖词典》和诺贝尔文学奖评委回顾诺贝尔文学奖的权威著作以及分类选本等。相信丛书出到八九十卷以至上百卷并有各类相关产品相继问世时,一座座华美的文学殿堂将吸引更多的读者一道跨入充满希望的21世纪的壮丽征程。

衷心感谢译者、读者和社内外同仁的携手合作!

衷心欢迎来自各方面的批评指教!

1991年12月26日

瑞雪天于桂林

· 译本前言 ·

西班牙新小说的先驱

林一安

1942年，在西班牙内战后岑寂而压抑的文坛上，出现了一部篇幅不大、标题也不醒目的中篇小说：《帕斯库亚尔·杜阿尔特一家》。但是，人们在阅读之后，却不禁为作者的胆量暗暗吃惊。

小说以回忆录的形式写出，前后还加了重抄者（即发现和整理这部回忆录手稿的人）的说明，以期造成“真实效果”；其实，故事并不复杂：回忆录的作者即小说主人公帕斯库亚尔·杜阿尔特是西班牙一个乡村小镇的青年，他善良、淳朴，对未来满怀憧憬。但不幸的是，他的家是一个贫困、愚昧、落后的家庭。父亲年轻时是个走私犯，被判过刑，坐过牢，出狱后，意志消沉，终日狂喝滥饮，任意打骂妻儿，借以发泄。家人对他十分厌恶，但慑于他的淫威，敢怒而不敢言。一天，他狂犬病发作，家人积聚在心头的怨恨终于有了渲泄的机会：他们用暴力将他关进壁橱，把他活活折磨死了。母亲是个目不识丁的村妇，既愚昧无知，生性又剽悍粗野。面对丈夫的凌辱，她毫不示弱，总是以牙还牙，棍棒相迎。她对于子女冷酷无情，从未施过母爱。她的小儿子智能低下，肢体残缺，是她与人私通的产物。当她的情夫狠踢这个可怜虫时，她竟放声大笑，毫无怜悯之心。帕斯库亚尔从小也受到父母的虐待，享受不到人间

的温暖。他一生坎坷，命运多舛：好不容易结婚成家，可外出度蜜月时，他和妻子同骑的一头母马受了惊，导致婚前受孕的妻子小产。帕斯库亚尔在盛怒之下用刀捅死了母马。后来，他的妹妹和妻子遭到流氓埃斯蒂劳侮辱，他气愤已极，便与之决斗，将他活活踩死。帕斯库亚尔于是被判处二十八年徒刑。服刑期间，他表现良好，满心希望重新做人，后被减刑为三年，期满释放。谁知出狱后，他因不堪忍受恶毒的母亲的骚扰，终于用柴刀将这个给家人带来许多不幸和屈辱的泼妇杀死，从而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被处以绞刑。

这部小说的作者就是1989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西班牙著名作家卡米洛·何塞·塞拉。当时，他年仅26岁，只发表过一本诗集，题名为《踏着白日犹豫的光芒》(1935)，在西班牙文坛可以说是无名小卒。

可是，就是这位小青年的这样一本薄薄的小书，却在西班牙闹出了一场轩然大波！文学界反响巨大，一时间好评如潮，一致认为此书一扫内战后西班牙文坛沉闷而萧条的空气。西班牙著名文学评论家贡萨洛·索贝哈诺认为：“《帕斯库亚尔·杜阿尔特一家》的问世，一举证明了西班牙小说界蕴藏着巨大的新的活力，为复苏和重建西班牙现代小说莫下了第一块基石，同时也从根本上扭转了40年代西班牙读书界只注重外国翻译小说的兴趣。”^①而且，塞拉在这部中篇里表现的自然主义倾向，还被一些文学评论家称为“可怕主义”或“可怕现实主义”。这是因为，小说中除了有大量令人毛骨悚然的残忍行为描写之外，还有意扭曲人物的形象，有时甚至把人的行为和动物的行为等同起来，造成一种厌恶感，从而深化读者对这种行为的厌恶，进而憎恨形成这类行为的社会诱因。有的评论家指出，就

① 贡萨洛·索贝哈诺：《当代西班牙小说》（1975），第33页。

美学意义和叙事艺术而言,《帕斯库亚尔·杜阿尔特一家》一书也是对传统的有力挑战和成功背叛:它彻底变更了读者一味接受、叙述者无所不知、故事情节按部就班地发展、小说结构四平八稳等陈旧程式,为西班牙新小说的拓展开了风气之先。

当时,西班牙法西斯势力已夺取政权,正受到其御用文人的一片歌功颂德、粉饰太平的肉麻吹捧和疯狂鼓噪,塞拉居然创作出这样一部揭露人间黑暗、唤起社会控诉的小说,应该说是难能可贵的。然而,该书也立即遭到官方和教会的强烈指责,后来还被查禁。其实,原因也很简单:这部作品表现了战后西班牙人民的幻灭和绝望,而它要告诉西班牙人民的是,西班牙社会内部沉积着一种愚昧落后的文化,这样的社会只会窒息人性,是造成现实罪恶和怨怨相报的冲突的真正祸根;而毫无人性的法西斯政权连同它那严密控制的书刊检查,更是扼杀人性乃至新生命的绞刑架和刽子手!

事情闹得天翻地覆,人们自然会把好奇的目光转向胆大包天的青年作家身上。人们这才搞清,这个年轻人全名为卡米洛·何塞·塞拉·特鲁洛克(Camilo José Cela Trulock),1916年5月11日出生于西班牙西北部加利西亚地区拉科鲁尼亚省帕德隆市伊里亚—弗拉维亚县,父亲是西班牙人,母亲兼有英国和意大利血统。

九岁时,塞拉随全家移居马德里。进入大学后,曾攻读法律、医学、哲学和文学。1936年,西班牙内战爆发,塞拉中途辍学,离开马德里,参加佛朗哥的军队,当了一名士兵,胡里胡涂地替法西斯卖命。然而,血腥的无意义的杀戮和人性的扭曲强烈地震撼了他,使他醒悟。1939年内战结束后,他开始独立反省那场战争,认识战后的现实和理解人生。塞拉退役回到马德里后,为谋生计,曾当过小公务员、画匠、电影演员、斗

牛士，甚至柔道教练。广泛丰富的阅历为塞拉日后的文学创作提供了厚实的素材。

长期内战后的西班牙，满目疮痍，人民生活极端贫困，但在法西斯政权的文人墨客粉饰下（佛朗哥本人就带头写了一本为反革命内战歌功颂德的“小说”），广大民众受到蒙蔽和欺骗，一时不明真相。这时，塞拉毅然推出《帕斯库亚尔·杜阿尔特一家》这样一部血淋淋揭示人性扭曲的作品。应该说，这同时也是作家在思想认识上觉醒的一个飞跃。作家深刻地告诉读者，原来秉性善良的人之所以沦为冷酷、凶残的杀人犯，走上绞刑架，乃是恶浊的社会环境使然。这才是灭绝天良的真正祸首元凶！

这部小说当然也有不少缺陷甚至失误，例如，作品中的一些自然主义或“可怕现实主义”的描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深化了读者对西班牙社会现实的憎恨，从而激起一股颇有影响的社会抗议浪潮，但同时也造成了读者沉重的心理负担和消极的反感情绪，有些恐怖场面的描写过于直露，令人不忍卒读。另一方面，作品中有不少情节描写、人物的心理刻画乃至形象塑造都没能充分展开，因而显得简单、稚嫩甚至牵强，比起40年代即被国际文坛“重新确认”的一些拉丁美洲小说来，如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的《交叉小径的花园》、危地马拉作家阿斯图里亚斯的《总统先生》和《玉米人》、古巴作家卡彭铁尔的《人间王国》，似乎就稍逊一筹了。

然而，如果考虑到塞拉当时所处的艰难的社会环境以及他对西班牙战后小说所起的作用和影响，那么，认为他的这部中篇“开创了西班牙小说的新阶段”^①，应该说不失为一种公允

^① 马利亚诺·安托林·拉托：《圣卡米洛：文学巨星》，西班牙《变革16》杂志，1989年10月30日，第8页。

的评价。

1951年，塞拉花了五年时间写成的重要长篇小说《蜂房》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出版，不仅受到西班牙读者的广泛欢迎，而且还引起了最为苛刻的文学评论家的注意。

小说共分六章和一个尾声，描写的是西班牙内战结束后不久而世界大战正在进行时的马德里下层社会。故事发生在1942年12月短短的三天里：青年诗人马丁失了业，生活无着，终日放荡不羁，无所事事，出入饭馆酒肆，打发日子。有一天，他在罗莎开的小咖啡馆里吃了东西而付不出钱，被老板娘当众逐出门外。小说以此为线索，围绕着活动在小咖啡馆周围的三百余名各色人物展开，其中有工人、职员、医生、警察、小贩、妓女、流氓、跑堂的、放债的、巡夜的、擦皮鞋的……三教九流，纷繁复杂。小说最后以妓女马戈特被人在厕所里勒死，警察准备传讯马丁作为结束。

小说不仅隐喻这家咖啡馆活像一个营营不息地骚动着的蜂房，战后西班牙普通百姓整日为生活忙碌奔波，仿佛一只只疲于奔命的蜜蜂，饱受贫困、饥饿、绝望、空虚等肉体上和精神上的巨大痛苦，而且还通过描写这些芸芸众生之间只知金钱和情欲而不知其他的冷漠关系，刻画出他们孤独、隔阂的心态，暗示他们好像被禁锢在一个个六角形的蜡巢里，坐以待毙。

西班牙著名文学评论家安赫尔·巴桑塔认为，除了深刻的社会意义外，《蜂房》一书在写作技巧上“也不愧为西班牙小说中最为杰出的作品”，“开创了西班牙小说的新时代”^①。

综观全书，这部小说在艺术手法上有四大特点。一是客观主义的描写。塞拉本人承认，“我的这本小说……是按照生活

^① 安·巴桑塔：《西班牙小说四十年》（1979），第12页。